

外宣“三贴近”之翻译思想检视及其理论化路径

李方超

四川民族学院 外国语学院

DOI:10.12238/er.v4i4.3774

[摘要] 外宣“三贴近”是外宣翻译研究中的一个高被引概念。这一概念本身并未得到深入研究。本研究试图剖析其中孕育的翻译思想,突显其理论价值,为外宣翻译实践演绎更具有可操作性的翻译对策。这既能深化外宣翻译理论研究,也能为实践提供指导,在构建中国特色翻译理论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 外宣“三贴近”; 翻译思想; 中国特色翻译理论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方梦之(2021)认为2000至2020年这20年来我国的译学话语体系的四大特征:第一、新理重出;第二、新概念、新术语蔚起;第三、新范畴涌现;第四、创新话语表达方式;并列了近10年首创的10个术语,如文章学翻译学、译者行为批评论等。黄友义2004年提出的外宣“三贴近”原则理应也是过去20年译学话语体系的勃兴之路上的产物。外宣“三贴近”(three adequacies for foreign publicity)这一原则作为独立词条被收录到方梦之主编的《翻译学辞典》(2019)。查阅中国知网关于此文的引证文献数量,共计1355篇。可见外宣“三贴近”在外宣翻译研究领域影响之深。然外宣“三贴近”作为译学新术语并未引起翻译界的足够重视。

1 外宣“三贴近”研究现状

黄友义2004年在中国翻译发表《坚持外宣“三贴近”原则,处理好外宣翻译中的难点问题》一文,提出外宣翻译原则——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的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目前对于外宣“三贴近”的研究多见于引证文献,谈外宣翻译“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的文章居多,如陈小蔚的《外宣翻译中“认同”的建立》;张健的《全球化语境下的外宣翻译“变通”策略刍议》等文章。原因至少有二,诚如黄友义认为“一般情况下,凡

是要对外介绍的素材,理所当然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和贴近国外受众需求的”,其一。可见提出者认为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和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本身之于外宣翻译而言毋庸置疑,也就是翻译工作者默认的应尽本分,何况外宣工作既严肃又责任重大,外宣翻译材料也都是经过了精心挑选,层层把关。然而“应然”与“实然”之间往往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我们认为有必要对前两个贴近原则加以重视;其二,三原则研究的不平衡恐怕与我国以往外宣翻译实践中的“死译”“硬译”“绝对忠实”原文的翻译实践及其对此诟病有关。一定意义上,外宣“三贴近”为外宣翻译中的以往翻译实践误区“松绑”,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国家领导人谈治国理政》的三卷译本海外热销以及十八大以来党政文献的英译效果的海外读者积极良好反馈足以佐证。

但倘若存在对“三原则”的误读,造成译文有失偏颇,后果可想而知。具体到外宣翻译,国内翻译界无论是研究者、实践者还是翻译教学人员,似乎都存在“外媒独尊”的思维倾向或做法。从翻译界对这些说法的耳熟能详可见一斑,如“这么译,对不对,要向外国人求证,看看他们的反应”“英文中有没有类似表达,可以到谷歌,必应等上面考证”。这些说法力图让外宣翻译做到“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进而可能忽略前两个

原则。同时,对于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也并非是一味的贴近,在强调中国话语创新表达的背景下,一些中国英语表达逐渐也被国外受众理解并接受。

2 外宣“三贴近”之翻译思想检视语理论化路径

从翻译理论角度审视外宣“三贴近”,我们易得“贴近中国的发展实际”讨论的是外宣翻译首先要“贴近或靠近”中国的发展实际这个“大文本”“大语境”。“贴近国外受众的信息需求”则关系译什么,即外宣翻译素材或文本的选择,译国外受众喜闻乐见的“中国好故事”,牢记外宣不同于内宣,材料翻译上应有所区别。“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讲如何译的问题。译什么、如何译,属于翻译理论的本体论。可见“三贴近”蕴含了丰富的翻译思想,尽管表述上不像是理论性的学术话语,但具备理论特征与潜质。

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表述为:第一,译文应该完全传达原文的思想;第二,译文的写法和风格与英语原文的写法和风格性质相同;第三,译文应如同译语创作一样流畅。可见,第一个贴近大致对应泰特勒三原则中的第一条原则,第三个贴近则和泰特勒第二、第三条原则贴近。“贴近国外受众的信息需求”则独有,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接近读者反应论或是可接受性理论。泰特勒指出,三条基本原理按其重要性排列,当三者

无法同时满足时,可以按照其重要性作出依次牺牲。

外宣“三贴近”内部逻辑上也是按其重要性排列,且应统筹考虑不可割裂。我们不妨按照外宣“三贴近”给外宣翻译做如下定义:外宣翻译就是从中国发展的实际出发,在全面分析国外受众对我国信息需求的基础上,选择性地对外翻译国外受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故事且译文表述应考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

在外宣“三贴近”原则中,第一个贴近是我国外宣翻译工作的“根本”,即在贴近中国发展实际的前提下,力图做到后“两个贴近”。只要外宣翻译“贴近中国发展实际”,理论上可采用任何翻译对策使译文做到后两点,这也符合翻译的目的论。然而,提出者未对这一共识性问题并做过多论述,加之到具体的翻译实践,由于文化背景、社会发展阶段以及国情等巨大差异,无论研究者还是翻译者首先更多的是关注“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但研究表明“三贴近”作为一个整体,有其内部逻辑次序,断章取义强调某一个方面于理论与实践百害无益。这是相关研究模糊了“应然”与“实然”的界限;也与特定时期的外宣译文质量有关。当下之考虑受众,一味追求读者反

应和“外媒独尊”的倾向与其不无关联。因此不能忽视“三贴近”内部逻辑性及其层次性,有必要对其全面审视。

更何况贴近中国发展实际本身就是一个“常新”话题。中国不断向前发展,就会不断产生新的实际。译者若缺乏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新实际的研究,加之没有现成译法可用就会造成翻译的巨大困难。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我国经济制度的最大实际,是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外受众非常渴望的信息,我们若贴近国外受众思维习惯,就不可能将其译为“socialist market economy”。但我们仍应采用上述译法,并解释性翻译,力争让其更加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久而久之这类中国英语表达话语也会为国外受众理解接受。

3 结论

本世纪头20年我国译学发展立足本土、创新理念,致力于中国特色翻译理论的构建,成绩斐然。外宣“三贴近”作为外宣翻译的一个重要思想,产生了积极影响,从译学学科话语理论层面对其加以提炼、抽象与理论化表述,并借助构建量大自足、充分的外宣翻译语料库从实践层面加以验证,是其理论化的可选路径。

[基金项目]

本论文是四川民族学院校级自办科研项目“机构译者行为研究——以外文局《治国理政》用典英译为例”(项目编号:XYZB2025SB)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Munday,J.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3rd edition).[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12.

[2]陈小慰.外宣翻译中“认同”的建立[J].中国翻译,2007,28(1):60-65+96.

[3]方梦之.我国译学话语体系的勃兴之路[J].当代外语研究,2021,(01):29-37+1-2.

[4]方梦之.翻译学辞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5]黄友义.坚持“外宣三贴近”原则,处理好外宣翻译中的难点问题[J].中国翻译,2004,(06):29-30.

[6]张健.全球化语境下的外宣翻译“变通”策略刍议[J].外国语言文学,2013,30(01):19-27+43+72.

作者简介:

李方超(1990--),男,汉族,陕西凤翔人,硕士研究生,助教,四川民族学院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翻译学。